

浙江文史资料第五十九辑

东南佛地

盛世重光

浙江近现代佛教史料



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浙江省人民政府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编
浙江省佛教协会会



浙江文史资料第五十九辑

东南佛地 盛世重光

浙江近现代佛教史料

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浙江省人民政府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编
浙江省佛教协会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东南佛地 盛世重光
——浙江近现代佛教史料
浙江文史资料第 59 辑

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浙江省人民政府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编
浙江省佛教协会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虞印刷厂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上虞百官镇)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75 插页 6 字数 17.8 万 印数 1—4000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13—01432—3/K · 396 定价：14.50 元

前　　言

佛教传入浙江甚早。自三国两晋以来，历代在浙江各地都曾建有许多寺庙，其中不少古刹名寺，历经千余年的沧桑变迁，直到近现代；仍在海内外有着很大影响。这些千年古刹之所以声名远播，香火旺盛，又往往是与历代名僧大德的驻锡、护持分不开的。古刹林立，名僧辈出，古刹与名僧交相辉映，为浙江这一“东南佛地”增添了光彩，确立了浙江佛教在中国乃至世界佛教界的重要地位。

为了弘扬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抢救和保存弥足珍贵的浙江近现代佛教史料，宣传贯彻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如实反映自清末民初以来，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浙江佛教事业的发展状况，进一步扩大浙江佛教在海内外的影响，使佛教能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服务，以及进一步促进世界各国人民和平友好交往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与浙江省人民政府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浙江省佛教协会通力合作，编辑出版了这本题为《东南佛地 盛世重光》的浙江近现代佛教史料专辑。

浙江的古刹名寺，在由国务院于1983年公布的首批对外开放的全国重点寺庙名单中，就包括有杭州的灵隐寺、净慈寺，宁波的天童寺、阿育王寺、七塔寺，新昌的大佛寺，舟山普陀山的普

济寺、法雨寺、慧济寺，天台的国清寺、高明寺、中下方广寺和温州的江心寺等 13 所。收入本书的浙江名寺史料，即以记载这 13 所寺庙自清末民初以来至今的兴废沿革状况为主，着重介绍这些寺庙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修缮、重建和恢复开放，以及开展海外宗教联谊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具体情况。其中《解放初期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的修复》和《古刹新貌——改革开放后的杭州灵隐寺》两文，翔实完整地记载了解放初期和改革开放以后灵隐寺的两次大修过程，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宗教工作的关心和重视。《“文革”初期封存灵隐寺亲历记》一文，系“文革”前曾任杭州市常务副市长的顾春林同志所撰，作者以其亲身经历，向人们叙述了“文革”初期灵隐寺究竟如何得以封存，然却鲜为人知的一段真实历史，对流传甚广，却又查无实据的“周总理下令封存保护灵隐寺”之说，以当事人第一手的“三亲”史料，作了实事求是的匡正，资料弥足珍贵。《普陀盛典》一文详细记载 1989 年 10 月 18 日（农历九月十九日）普陀山于北京发生政治风波之后，成功地举行了有 10 几个国家和地区、1000 多位海内外来宾参加的普陀山“佛像开光，方丈升座”法会的盛况，反映浙江佛教界在促进社会稳定和开展海外联谊工作中所作的特殊的积极贡献。《古刹重光 天台弘阐——天台国清寺大整修纪实》，记述了“文革”初期国清寺被毁后，1973 年国务院下令全面整修国清寺，“以供日本佛教徒朝拜”的特例寺庙整修史实，体现了佛教在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中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介绍其他几座名寺兴衰重建史实的文章，也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这些古刹名寺在历尽劫难之后，得以普庆重光的崭新气象。

浙江近现代的名僧（包括外省籍而曾在浙江从事过宗教活动的）为数甚多，其中影响最大的，有家喻户晓的弘一法师、首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圆瑛法师、一家三代为僧的兴慈法师、致力佛教改革运动的太虚法师、以天台山为第二故乡的海灯法师、为

国清寺的振兴而竭尽心力的唯觉法师、组织僧尼救护队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诗僧木鱼法师、支援浙东抗日游击纵队抗日的爱国僧人月西法师、普陀山历史上的第一位全山方丈妙善法师等等。

这些名僧大德爱国爱教，精研佛学，培养僧才，保护古寺，弘法扬善，为浙江佛教事业增光添彩的事迹和精神，本书都有专文从不同的侧面，以不同的体例一一作了详尽介绍。各文的排列以传主的出生年月先后为序。

浙江天台山国清寺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韩国佛教天台宗和日本佛教天台宗都把国清寺视为祖庭，改革开放以来，韩国和日本佛教天台宗不断组团前来国清寺参拜祖庭，《记中韩两国佛教天台宗的友好交往》和《中日佛教天台宗当代友好交往录》两文，记载了中、韩、日三国天台宗进行友好交往的详细过程，是浙江佛教在对外友好交往中充分发挥积极作用的最好说明。

原浙江省宗教事务局局长杨子林同志，应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特邀，在其所撰《党的宗教政策使千年古刹重现光彩》一文中，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浙江如何贯彻落实宗教政策，佛教协会组织的恢复，省内各全国重点寺庙的修复和开放，几次盛大涉外佛事活动的举行和浙江佛教界的对外友好交往等等方面的情况，都作了全面的回顾和总结。现将这篇提纲挈领地综述当代浙江佛教盛世重光的文章，作为本书的代序，以便读者得以从中了解浙江佛教界的新貌概况。

浙江的古刹名寺很多，差不多每个县、市都有千年以上历史的古刹丛林，无法逐一予以介绍。因此本书只能有选择地收入灵隐寺等13所全国重点寺庙的有关史料，有代表性地、客观地反映出近现代浙江佛教兴衰变迁，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欣逢盛世，迅速恢复、发展、兴盛的过程。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乱世百业凋零；治世则百业兴盛。愿劫后重光的浙江佛教事业，能在当今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时期，为促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而继续发挥自身的积极作用。

本书顾问杨子林、严紫娟、俞昶熙，主编叶炳南、顾志兴，副主编言均君、汪琴烜，编委宋子亢、李祖荣、韩森。本书在编辑过程中，曾得到有关的各地政协文史委、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佛教协会，以及浙江佛教界有关人士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在此谨致谢忱。限于水平，书中挂一漏万，谬误不妥之处恐尚难免，祈望方家和读者指正。

编 者

1996年7月

党的宗教政策使千年古刹重现光彩

(代序)

杨子林

佛教自东汉从天竺西域传入我国，至今已有2000年左右的悠久历史，在群众中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信仰者甚多。我省是全国较早的佛教传播地之一，历史上在全省各地都建有许多寺庙，像杭州灵隐寺、净慈寺，宁波七塔寺、天童寺、阿育王寺，天台国清寺、高明寺、方广寺，新昌大佛寺以及被称为“海天佛国”的普陀山普济、法雨、慧济三大寺院，还有温州的江心寺等，都是历史悠久，并具有珍贵佛教文化艺术价值的千年古刹，名闻全国，在日本和东南亚各国也有很大影响。1983年这些寺庙均被国务院颁布为汉族地区全国重点寺庙。

但是，在“文革”十年浩劫中，党的宗教政策被践踏，我省的这些著名千年古刹，也在当时的所谓破“四旧”风暴之中，大多遭到了严重破坏，寺庙房屋有的被拆或被占，佛像和宗教用品被砸毁，佛经藏书被焚烧，僧人被赶出庙门，不少古刹名寺变成了一片断墙残壁、蜘蛛网遍布、破烂不堪的废墟。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了贯彻，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我们省政府宗教事务局作为全省宗教工作的主管部门，在维护和贯彻政府宗教政策的工作中，也为恢复我省正常的宗教活动场所作了很多努力。在佛教方面，我们着重抓的工作就是把那些被占

被拆的著名寺庙尽快收回并进行整修开放。这既是为了团结广大信教群众，使他们重有过宗教生活的场所；又是为了保护文物古迹、园林名胜；同时也是为了适应对外开放，与海外佛教界人士开展友好交往活动的需要。在落实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虽然也曾遇到过很多困难，但由于有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有关政策的具体规定，在省委、省政府的重视和有关部门的支持配合下，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我们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并使一些问题（例如归还被占用的寺庙房屋等）逐步得到解决，从而确保了我省重点寺庙整修、开放工作的较顺利进行。

修复寺庙工作，首先需要建立佛教协会组织，依靠和发挥佛教界人士的力量。为此，经省里同意，于1980年4月召开了全省第一届佛教代表会，正式成立了浙江省佛教协会，选举佛教界中有声望、佛学造诣深的人士担任领导。与此同时，有关市、县也先后相继恢复和建立了佛协组织，并且陆续把一部分僧人请回寺庙，由他们来负起管理和修复寺庙的责任，提出“庙像庙，僧像僧，僧人管庙”的要求。此后，僧人重新穿上了僧装，寺庙也逐步恢复了各种制度。

为了加强寺庙整修工作的领导，有关寺庙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大多建立了由政府有关部门、佛协和寺庙僧人共同组成的寺庙整修委员会，负责整修寺庙的各项具体工作。当时，在整修工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一是被占用的寺庙房屋归还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寺庙的房屋被占用的很多，如天童寺、阿育王寺的房屋被工厂、部队等单位占用；七塔寺被供销系统和工厂占用；普陀山的寺庙几乎全被当地政府的各个部门、部队和居民所占用，等等。如不归还寺庙就无法进行整修开放。为此，需要与有关单位经过多次的联系、协调才能解决。在协调过程中，既要与有关单位统一思想，认识到归还寺庙房屋是落实宗教政策和对外开放的需要，又要从实际出发，采取先易后难，有重点地逐步进行。如

有的寺庙已被占用单位作为厂房、仓库，不容易马上归还，则适当放宽归还时间，并且为了尽可能不影响生产和职工的生活，还要在经济上给予一定的搬迁补偿。工作中遇到阻力的，当地政府领导还亲自出来做说服、协调工作，并协助解决问题。所以总的说来，这些寺庙的房屋政策落实工作，尽管困难很多，但由于领导重视和有关单位配合，进展还较顺利，短短几年时间，大部分被占用的房屋都如期归还，使寺庙能及时得到整修开放。二是经费问题。由于宗教政策过去受到较长时期的破坏和干扰，寺庙收入很少，经济困难，自身难于解决维修资金，这是当时困扰寺庙整修工作的一个难题。为了解决这一困难，国务院和省政府曾多次分别给一些重点寺庙拨款，例如 1978 年国务院给天童寺、阿育王寺拨维修款 150 万元；1979 年省政府给普陀山拨款 40 万元，抢修濒临倒塌的寺庙危房。此外，为了能使寺庙增强自身经济力量，实现“以寺养寺”、“以寺养僧”的目标，政府有关部门还批准这些寺庙不等整修完毕就开放，实行边整修、边开放的办法，使寺庙早日恢复宗教活动，增加经济收入来源。这样做的结果，既满足了国内外信教群众进庙烧香拜佛的要求，扩大了宗教政策的对外宣传和促进了对外友好交往，又使寺庙得到了经济实益，解决了维修经费不足的困难。如普陀山自 1979 年起边整修、边开放，海内外信徒的捐赠香金和佛事收入，当年就有 9 万余元，1980 年有 63 万余元，1981 年达到 178 万余元，逐年增加，不仅解决了寺庙维修经费，改善了僧众生活，而且还办了许多社会公益事业。据普陀山佛协 1993 年年终总结所载，10 多年来，他们在寺庙建设等方面的总投资已达 4427 万元。又如灵隐寺边整修、边开放以来，门票和香金以及海外信徒的捐赠等日益增多，收入数额可观，不仅能解决寺庙正常维修，还有能力于 1987 年实施 10 年修建规划，现已完成重建后大殿、翻建大悲阁、增设五百罗汉碑室等工程，使灵隐寺的建筑格局更加符合佛教寺院的要求。以上这些都是在党

的宗教政策指引下，寺庙实行整修开放后才得以实现的。

下面再举一些具体事例，以便人们能够从中了解我省一些著名古刹在整修开放过程中的片断情况，及其在对外交往中的影响和作用。

一、天童寺重塑佛像

天童寺在“文革”中破坏严重，佛像几乎全被毁坏，需要重塑，任务很重。如何把佛像塑好，当地整修委员会和寺庙僧众都十分重视。佛像形象，主要是要符合宗教格式的要求，是神而不是人，同时也要有艺术水平，具有历史保存价值，能体现出一座大庙的雄伟、庄严。1979年该寺招募了一批社会上的民间艺人，参照过去留存的一些佛像照片，先制部分小样，在反复研究、修改基础上，逐步塑造出佛像泥胎。为了保证佛像造型的质量，我们还专门邀请了浙江美术学院邓白、史岩教授及工艺美术师傅到寺庙进行审查评议。他们十分认真仔细地审看后，与当地的领导、寺庙负责人及工人师傅一起研究，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如认为：四大天王脸部表情不够丰富，应有愤怒样，也要有慈悲样，要具有大无畏的精神，像警卫一样，守护佛法；指出模型的腿和手太短、脚太大，比例不够协调。要求弥勒佛造像的笑，要笑得可爱，能引人发笑，皆大欢喜，肚脐要露在外面，胸部肌肉要丰满，手要肥壮一点。韦陀佛形象应慈悲、威武；模型的体型太短、眼睛太翘，后面飘带要高一点，要有风动感。大殿上的三世佛，眼睛要三分开，视线向下，向着拜佛信徒，使信徒向上看就能接触佛的视线，佛像后的背光，不要放大鹏，应用火焰纹。另外对十八罗汉等其他佛像，也分别作了评说，提出了修改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对后来塑造好佛像很有启发和帮助。由于精心组织，广纳意见，反复修改，终于使天童寺的佛像塑造得比较完美，符合了佛教格式的要求，得到了许多佛教信徒和游客的赞扬，认为这些佛像庄严、肃穆、威武、雄伟，进寺庙看到佛像既使人肃然起敬，

又感到是一种艺术享受，给寺庙增添了光彩。

二、抢修普陀山危房

普陀山作为全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闻名海内外，人称“海天佛国”。普陀山历史上香火很盛，寺院、僧人众多，曾有过“见宅皆寺，见人皆僧”的盛况。但是，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岛上的寺院长年失修，风吹、雨淋、日晒、虫蛀，加上“文革”中被破坏，有许多寺院房屋岌岌可危，随时有可能倒塌。由于该岛每年7—8月份是台风季节，如不及时加以维修，一旦受到台风袭击，大部分危房就会被刮倒，这批房子就将不复存在，再要重建就更困难。为此，1979年4—5月间，刚成立不久的普陀山管理局在台风季节即将到来之际，根据当时舟山地区行署的指示，为保留这批危房，向省政府紧急报告，申请拨款维修。随即又派该局领导来省里向有关部门汇报。我们在了解这一情况后，认为事情确实很紧急，不能延误，就当即与他们一起找到省政府秘书长汇报，秘书长在听取汇报后，十分重视，亲自着手办理。在省领导的重视和关怀下，很快就批下了40万元拨款，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同时省领导还要求有关部门赶在台风来临之前进行抢修，做到不倒、不漏。根据省里的指示和拨款，普陀山管理局立即组织施工力量，与寺院僧人相互配合，对要倒的危房进行了抢修，抵御了后来台风的袭击，安全地度过了台风季节。由于危房得到了加固，特别是主要殿堂没有倒塌，为以后的进一步整修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普陀山的一尊观音头像

1979年4月省政府为落实宗教政策，满足国内信教群众到普陀山进香拜佛的要求，同意普陀山整修开放。但是“文革”中普陀山寺院的佛像已全被损毁，寺院大殿无佛像可供，特别是普济寺圆通殿，是普陀山观音道场的重要殿堂，也成了一个空壳大殿。群众到普陀山日渐增多，没有佛像，就到处乱烧香，难于管理，影

响寺院的安全和全山的环境卫生。但当时要马上塑造佛像，不仅财力物力有困难，而且要赶在第二年（1980）农历二月十九日观音生日，迎来更多的香客之前，时间来不及。为此只有寻找是否有遗留下来的佛像，正在此时，一些群众从观音跳下找到了一尊较大的观音头像，送到普济寺。这尊头像很完整，但没有身子，于是就请人用木头钉了一个架子，再把香客送来的红绸布围在木架外面，成了观音的身子，这样一尊观音菩萨就供奉在圆通殿中央，尽管那时普济寺还很破旧，但有了观音菩萨像，信徒来烧香的就越来越多，普陀山也开始热闹起来。港澳地区有些信徒知道这个消息后，也纷纷前来朝拜。而且在1980年初还接待了第一批日本佛教参拜团，该团由日本曹洞宗大本山总持寺监院松蒲英文率领，在参拜过宁波天童寺祖庭之后，慕普陀山观音之名，恳切要求到普陀山朝拜，当时普陀山尚未对国外开放，但为了满足日本佛教徒宗教信仰上的要求，促进两国佛教界开展友好交往，经我们向省委报告，得到了批准。日本佛教参观团在普济寺看到这种情景，很受感动。说过去观音本来要去日本，因遇风浪受阻，留在普陀山不肯去了。他们以为前几年中国消灭宗教，观音也没有了，今天看到观音还在，而且烧香的人很多，这是没有想到的，说明中国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日本信奉观音的人很多，希望今后能允许更多的日本佛教徒到普陀山朝拜。就这样一尊观音头像，满足了许多信教群众朝山进香的要求，在普陀山的整修开放中发挥了吸引凝聚作用。

四、几起盛大的涉外佛事活动

我省佛教与日本佛教的关系密切，源远流长。

一是日本佛教曹洞宗。该宗道元禅师于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入宋参学，得法于天童寺如净法师，回国后开立日本佛教曹洞宗，现拥有800多万信徒，15000多座寺庙，成为日本佛教的一大宗派。他们把天童寺尊为祖庭，尊如净法师为祖师。建国后，该

宗与我们来往很少，对我国宗教政策不甚了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天童寺等寺庙陆续修复开放，才开始接触，起初先派遣少量的佛教团体前来寻访参拜，经过实地访问，目睹了我国信徒在庙内自由烧香拜佛和寺庙整修、僧人管庙等情况，对我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才慢慢有了认识和信任，消除了疑虑。随后该宗信徒不断地组团前来朝拜祖庭。该宗永平寺、总持寺两个大本山的贯首也分别亲自率团到祖庭朝拜，促进了与我们友好关系的发展。

二是日本佛教天台宗。该宗是日本传教大师最澄于唐贞元二十年（804年）入唐求法，在我省天台山受学于道邃、行满，学成回国后所创立的。天台宗在日本传播甚广，现拥有信徒500多万，也是日本佛教的一大宗派。该宗一直尊奉国清寺为祖庭，尊奉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及其继承人道邃、行满大师为祖师。近年来该宗和支系组团参拜祖庭、巡礼祖迹者络绎不绝，该宗座主山田惠谛长老多次来访，直至年逾九十之际还亲自率团到祖庭朝拜，表示不忘祖恩，并祝愿两国佛教界的友好世代相传。

由于日本佛教这两大宗派与我省佛教界有着如此深厚的因缘关系，他们出于报恩之心，多次提出要为祖庭、祖师建立墓碑，并举行盛大法会，以示报恩纪念。为了增进两国佛教界的宗亲友谊，经国务院宗教局和中国佛教协会同意，在80年代曾与日本佛教界共同举办了多起大型佛事活动，现略述如下：

1. 天童寺举行《日本道元禅师得法灵迹碑》落成揭幕仪式和盛大法会

《日本道元禅师得法灵迹碑》是由日本佛教曹洞宗大本山永平寺捐资，于1980年11月在天童寺建成的。此碑的建立是天童寺和永平寺两寺友好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为此，永平寺于当年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组织僧众170余人，由日本佛教曹洞宗管长、永平寺贯首秦慧玉长老为名誉团长，先后分六批来我省朝拜天童寺祖庭，其中第四、五、六批共92人，于11月17日在天

童寺举行揭幕仪式和盛大法会，中国佛教协会十分重视这次具有佛教历史意义的活动，赵朴初会长和正果法师亲自陪同并参加法会。法会开始，先由天童寺僧众94人与日本僧众在佛殿诵经，向如净祖位上供，然后在钟鼓齐鸣声中，引磬导引，两国僧众进入云水堂，分列东西两序诵经。《日本道元禅师得法灵迹碑》由赵朴初会长、天童寺方丈广修法师、日本秦慧玉长老拈香说法揭幕，同时鸣放鞭炮，接着双方僧众继续诵经、上供，诵经、上供完毕，再先后由秦慧玉长老讲话、赵朴初会长致词，共颂道元禅师学成回国开创日本佛教曹洞宗的遗德。最后栽植友谊树。揭幕仪式在隆重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日本道元禅师得法灵迹碑》碑文系赵朴初会长所撰，并与日本秦慧玉长老分别以中、日两国文字书写题刻。现将中文碑文抄录如下：

日本道元禅师得法灵迹碑

公元一千九百八十年秋吉日 日本曹洞宗管长大本山永平寺
贯首比丘秦慧玉率众朝礼天童山祖庭树碑以表彰遗德

震旦居士赵朴初敬题并为颂曰

卓卓禅师 法海神龙 早参尊宿 禅教兼通 梯航入宋
访道天童 身心脱落 得法长翁 传衣太白 建刹伞松
正法眼藏 演义开宗 七百年后 德泽弥隆 云仍联袂
来礼遗踪 立碑献颂 永仰高风

2. 净慈寺修建如净禅师墓塔

日本佛教曹洞宗尊如净为祖师，为报法乳之恩，永平寺于1980年向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提出在杭州净慈寺修建如净禅师墓塔的要求。据此，中国佛教协会通知我省，并派管理佛教外事工作的中国佛教协会国际部负责人申在夫同志前来商议。如净禅师墓塔究竟在何处，因年代久远，墓塔早就破坏，不复存在，很少有人知晓。当时只能依据佛教史记载，如净法师曾住净慈寺，

圆寂后归葬南屏。因此墓塔肯定在净慈寺后山上。但净慈寺后山范围很大，要找到遗址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我们会同杭州市宗教处、佛协等有关同志一起寻找。还邀请建国后长期从事宗教工作的杭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吴少典同志参加。记得是在一个深秋的早上，我们按约定时间来到净慈寺，因那时后山属于荒山，大概因为禁山或属警卫地段等原因，从净慈寺后殿到后山的路都被铁丝网拦住了，我们几个急于找到墓塔遗址，竟不顾“禁令”，扒开铁丝网，弯着腰钻了过去。此山因长期无人清理，到处杂草丛生，由于前两天刚下过雨，地上还很潮湿，都是碎石烂泥，又没有路，十分难走，再加上野草长得齐腰高，草上的露水把我们的衣裤全弄湿了。尽管如此，为了中日两国佛教界的友谊，大家都毫无怨言，有一位同志开玩笑说，如净法师在地下 700 多年，想不到今天还会有人在找他，按佛教说法，这是因缘了。大家分头像寻找宝藏一样，拨开杂草乱石仔细寻找，凡看到有土丘石基之类的地方，就围拢来作一番认真分析研究，最后在山的东边一处，发现有较完整的石基，还有墓塔的碎石砖瓦，且与日方提供的墓塔草图方位相符，经过反复推敲论证，最后一致认定这就是如净法师墓塔遗址。这时已近正午，寻到了如净法师墓塔遗址，大家竟高兴得连疲劳和饥饿都忘却了。后来日本永平寺很快寄来修建墓塔款项，由我方雇请工匠按原墓塔格式修建，“如净禅师之塔”从此又恢复耸立在南屏山上。为了便于信徒上山拜谒，还特地修造了一条上山的石级小道。日本曹洞宗大本山永平寺于 1984 年专门组团前来举行隆重参拜仪式。1986 年新任贯首丹羽廉芳长老又率团来朝拜。为中日两国佛教界的友好交往增添了新的篇章。

1987 年 10 月 13 日，赵朴初会长访净慈寺、礼如净禅师塔、登钟楼后，作诗二首：

喜见烟氛净，禅房次第开。
如山堆大木，可是井中来。

百载重光祖师塔，深情遥忆伞松翁。

为寻渡水看花意，来听南屏七杵钟。

3. 净慈禅寺举行大梵钟重铸落成启鸣法会

净慈禅寺闻钟声，是杭州著名景观之一，乾隆曾题“南屏晚钟”景名。但“文革”十年动乱期间，净慈寺被占用关闭，再加上钟楼、大钟早已被毁，景观名存实亡。1984年日本曹洞宗永平寺为报答如净禅师法乳之恩，派遣该寺监院官崎奕保、副寺南泽道人等来杭，提议重铸净慈禅寺大钟和重建钟楼。经国务院宗教局同意，中国佛教协会支持，于1984年12月14日正式商定，由日方出资3000万日元，委托浙江省、杭州市两级佛教协会承办铸造1万公斤青铜大梵钟1口和钟楼1座。钟上铸有《妙法莲华经》1部及赵朴初、秦慧玉、丹羽廉芳所撰铭文共7万余字。为了保证大梵钟的音质、音量、造型等工艺方面的尽善尽美，杭州市佛协俞昶熙会长等人特去江苏、安徽等地有关寺庙参访、搜集资料，随后又聘请老艺人与承造单位杭州制氧机厂的工程技术人员共同商讨研制出合金配方、制模造型等工艺的施行方案。杭州制氧机厂因第一次承造如此巨钟，为保证质量，取得经验，先行铸造了一口两吨重的试验钟，获得了成功。最后定于1986年10月4日上午，在杭氧厂制钟现场，日方专门派来僧侣和我方僧侣一起举行宗教仪式，共同绕场诵经，一次浇铸完成。在大钟铸造期间，同时在净慈寺内建成两层三重檐、面积267平方米、高15.5米钟楼1座。于1986年11月21日由中日佛教徒共同举行隆重揭幕法会。日本永平寺贯首丹羽廉芳长老亲自率领庆祝净慈寺大钟落成法会访问团主团23人及日本信众350余人来杭，由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正果法师陪同，与我省各大寺方丈及杭州市信众400余人，共庆大钟启鸣大典。当天上午净慈寺内外和钟楼四周上下，瑞气氤氲，香烟缭绕，由正果法师和丹羽廉芳长老主法，中日双方僧